

第二章 革命的骁将(1911-1927)

一、沐浴辛亥革命的风雨

广州起义虽然失败，革命党人一时对前途感到渺茫，而实际上，一大批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参加起义，勇于牺牲，血的事实对整个社会产生了极大的震动，各界人民由此对革命产生了深切的同情。清王朝已经风雨飘摇，再也不堪一击了。不久，清政府由于财政困难，在列强的压力下，实行铁路国有政策，要将民营铁路收归国有，以便向列强出卖路权，获得借款，支持奄奄一息的残局。铁路国有政策严重损害了辛苦筹集的民间资本的利益，尤其在四川，铁路股款是从各阶层人民中收集来的，而清政府拒绝偿还已经亏蚀的股本，同时，对使用和尚存的股款也只能换发国家铁路股票，而拒绝发还现款，导致四川发生保路风潮。四川各界组织了保路同志会，向当局请愿，并于8月间罢市罢课。清政府采取了暴力镇压的手段，一方面命令四川总督赵尔丰严行镇压，一方面派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从武汉率兵入川。9月7日，赵尔丰在成都对和平请愿的人民进行大屠杀，从而进一步激起了人民的反抗，由同盟会和四川哥老会结合发动了保路同志军起义。消息迅速向长江下游传播。

在湖北新军中，革命党人进行了长期的工作。由于种种原因，武汉革命党人一直没有机会发动起义，因而力量得到了长期的蓄积，绝大部分的工作基础没有受到破坏。在海外的同盟会领导人往往机械地准备起义，他们对内地的形势缺乏直觉的敏感。而在内地长期蛰伏的湖北革命党人，虽然缺乏海外同盟会领袖的宽广视野，但他们熟悉国内形势，具有敏锐的直觉能力，加上长期蓄积的力量，机遇终于来了。这时，驻扎湖北的一部新军奉调随端方入川，而保路同志军起义的宣传品也随长江水漂流到了武汉。武汉革命党人迅速地行动起来，原有门户之见的共进会和文学社两派革命组织也携手合作，共同部署起义。然而，敌我形势复杂多变，革命机关也屡遭破坏，人心热烈而又紧张。10月9日，起义的军事总指挥蒋翊武面对扑朔迷离的局势，冒着失败的风险，断然下令当晚12点起义。但由于联络未成，起义没有发动，而总机关部又遭到破坏，刘复基等三烈士牺牲。10月10日夜，武昌新军中的革命党人面对着当局的压迫，在生死关头，不顾指挥机关破坏的不利形势，士兵们主动发动起义，工程第八营革命党代表熊秉坤打响了第一枪，起义士兵迅速占领了武昌城，武昌起义终于成功了。

还在武昌起义之前，谭人凤于10月6日晚到南京约见陈铭枢，告诉他武昌准备起义的消息，只是同盟会总部方面预定11省同时起义，认为时机尚不成熟，因此，谭奉派前往武汉劝阻。没几天，武昌起义成功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全国，陈铭枢和军校的同盟会员也兴高采烈，纷纷磨拳擦掌、跃跃欲试。他们连续开会，准备响应。当时，南京地区也已经风声鹤唳，两江总督张人骏顽固守旧，利用张勋等部旧军对新军严密监视。江浙革命党人虽然以上海为活动中心，但上海本不是军事重镇，也不是行政中心，所以，他们原指望南

京新军首先响应起义，然后上海、浙江同时并起，席卷东南。由于张人骏的压制，南京新军被收缴了武器，又受旧军监视，新旧军不断发生磨擦，一时无法发动起义。陆军中学学制两年，陈铭枢等已到了毕业的时候，本应经常使用武器进行野外军事演习和实弹射击。平时，学校将械弹集中储藏在礼堂后面的武器库中，同盟会员们即派人轮流监视着，准备起义时截获使用。学校当局已经风声鹤唳，竟偷偷地将武器库中的弹药全部运走。在张人骏的压迫下，第九镇统制徐绍桢不得不把新军带出城外，开往秣陵关驻扎。军校学生看到自己已成赤手空拳，对南京地区的形势很失望，觉得难以在当地响应起义，急于赴武昌前线参加战斗。大家公推陈铭枢前往上海，向总部请愿，并要求拨给旅费。这时革命形势澎湃，陈铭枢已决心退学，投入革命洪流，因此未办请假手续，悄悄越墙离开学校。当时，同盟会领导已经决心以武昌为中心，各省并起响应，所以，武昌起义成功，黄兴即从香港赶到上海，准备前往武昌领导整个运动。他们把江浙一带的响应任务交给了陈其美等当地的革命党人。10月25日晚，陈铭枢赶到上海，去机关部找到宋教仁，恰好宋准备动身，和黄兴一起乘船去武昌。陈铭枢匆匆向宋教仁说明来意，前线正需要军事人才，宋即问：“你们有多少人？”陈回答说：“大约有四五十人。”宋当即由皮包中拿出500元钱给他作为川资，并告诉他：“南京方面的事情，已派柏烈武（文蔚）负责，你可同他接头。”[1]第二天，陈铭枢即去见柏文蔚，柏很不赞成他们去武昌，经陈一再解释，方才同意。陈随即返回南京，到南京时才知道因为违反纪律已被学校开除，无法进校。于是邀同学出校商议，最后商定军校生分三批去武昌参加起义，陈铭枢率领第一批队伍先行，同行者有李章达、蒋光鼐、陈果夫等10余人。

这时，清军已大批南下，与革命军争夺汉口，血战频频。黄兴于10月28日到达武昌，给湖北的革命军以极大的鼓舞，第二天他就率部渡江，在汉口满春茶园设立司令部，指挥战斗。而同时，清廷重新起用袁世凯，袁以亲信将领冯国璋任第一军总统（军长）、段祺瑞为第二军总统，并亲自于30日到达湖北孝感督战。袁世凯指挥的北洋新军，是一支久经训练的军队，并有机枪等当时中国最具有火力优势的武器。而湖北新军经过抽调，已不能成建制战斗，士兵多系招募，缺乏训练。清军以强大兵力实施攻击，又纵火焚烧汉口，革命军浴血巷战，伤亡累累。正在血战之间，陈铭枢等军校学生到达武昌，热情高涨，他们看到汉阳兵工厂正处在敌军严重的威胁之下，当即要求过江保卫。年轻的军校学生，正值血气方刚，都督府劝阻无效，就把他们编为中央第二敢死队，并命令他们于翌日晨渡江，至汉口龙王庙登陆，向清军占据的循礼门前进。是日，敢死队开进至自来水塔（现中山路）附近，即遭敌军机关枪扫射。敢死队用步枪还击，由于敌人火力强大，再加地形不利隐蔽，无法继续前进，坚持到夜晚，仍撤回武昌。陈铭枢经历了第一次战斗的洗礼。

11月1日汉口失守。鉴于革命军缺乏统一指挥，11月3日，湖北军政府登台拜将，委任黄兴为战时总司令，设司令部于汉阳西门外昭忠祠。当时，湖北军政府都督为黎元洪，他本非革命党人，由于党人的幼稚，被推为都督，以首义领袖的资格，而凌驾于革命党领

袖之上。黄兴虽顾全大局，但军权仍多所掣肘，而且，他流亡海外多年，和湖北军界也比较隔膜，指挥十分困难。陈铭枢这批南京陆军中学的学生，先后三批到达有 100 多人，接受过系统军事训练，又和同盟会中枢建立有长期的联系。对于他们的到来，黄兴十分高兴，即将他们重编为学生军，直属总司令部，作为自己的亲随骨干部队，随侍左右，对各部进行督战。同学们原拟推陈铭枢为督战官（队长），但南京来的志愿人员中有非同盟会员而军中资格较高的张我权、徐源泉，陈即改推他们两人为正副队长，自己仍负责学生军中同盟会的工作。

在武汉血战期间，各省纷纷响应独立，湖南援军也先后到达前线，士气顿增，纷纷要求反攻。16 日夜，黄兴命令反攻汉口，以援鄂湘军为主力，自琴断口渡过汉水，进攻汉口玉带门；以鄂军第四协、第六协诸部为助攻部队，在汉阳东北南岸咀一带渡河，于龙王庙登陆，向中国街前进。学生军奉命在湘军之后跟进，向右翼延伸。当晚，学生军由汉阳出发，行军一整夜，于拂晓渡过汉水，黄兴骑着骏马，手握指挥刀，在张公堤上往来驰骋，指挥各部前进。湘军甘兴典部原为旧军，士兵乌合，遇雨竟躲进民房，被司令部督战人员驱上阵。学生军十分勇敢，率先向敌军发起攻击，越过张公堤后，即遭敌军猛烈炮火的拦截，队伍在水田中疏散前进。进至一村落后，因连续行军战斗，尚未用饭，正准备稍事休息，埋锅造饭，突然，左翼甘兴典部遭到敌军火力攻击后纷纷后撤，黄兴率左右人员严令制止，而溃兵如潮，阻拦不住，把学生军也扯动得立脚不住，被迫后撤。回渡时，敌军并未追击，而渡桥拥挤，各部竟至抢渡，把浮桥挤断，纷纷落水，遭到重大损失。学生军被冲散后，经过整理，才又集合起来，陆续经小船渡送，撤回汉阳。

学生军经过这些战斗，有一些人看到部队的伤亡，知道战争不是儿戏，有些胆怯，而有一些人，则看到湖北陆军第三中学的学生纷纷运动，当上了都督府的科员，有点眼红，觉得当兵屈才，不愿再在学生军服役。黄兴亲自集合学生军进行训话、劝说，希望他们留下来继续战斗，但没有多少效果，只好发给路费，让他们回到南京。陈铭枢、蒋光鼐等骨干尚有 50 多人没有动摇，留了下来，继续坚持战斗。几天后，清军对汉阳发动了全面进攻，革命军进行了艰苦的汉阳保卫战。当时，黄兴判断敌人将从汉阳正面进攻，因而仅以少数兵力驻守汉阳西部高地。清军抓住革命军的薄弱环节，以主力在汉水上游渡河，占领汉阳上游门户蔡甸，分甲乙两路，分别向三眼桥、琴断口进攻。南京学生军奉命向三眼桥——黑山（即扁担山）一线布防，与清军血战多日。清军久攻不下，遂在三眼桥一线进行钳制，而转移进攻方向，攻击美娘山。战至 26 日，汉阳各线均为清军突破，陈铭枢也随部退守武昌。

27 日，汉阳失守，黎元洪在都督府召开会议，应付严重的形势。这时，黄兴悲愤万分，对武汉地区将领失和的局面也感到无能为力，但他只是自己承担放弃汉阳的责任，表示深感惭愧，决定辞去战时总司令职务。同时，上海已经光复，于沪上参加革命的张謇、汤寿潜等人也派人到武汉，希望黄兴前往上海主持组织中央政府。事实上革命的中心地正在转

移到以上海为主的东南地区，因此，黄兴表示要往上海与同志计划进攻南京，作为武昌的声援。汉阳既已失守，黄兴心力交瘁，与鄂中各将也颇多矛盾，留也无益，即于当夜赴汉口乘轮，翌晨离汉东下。临行前，黄兴挑选了一批学生军随扈自己，陈铭枢是学生军中同盟会的骨干，被黄兴选上，成了黄的卫士，于12月1日到达上海。蒋光鼐等另一些学生则仍留在武昌青山一带。

这时，东南地区的形势发展很快，对同盟会也十分有利。上海在同盟会的陈其美、光复会的李燮和等合作努力下，已于11月4日为革命军占领，6日推举陈其美为沪军都督。前一日，在沪上革命党人的策应下，浙江革命党人起义占领杭州。驻苏州的江苏巡抚程德全宣布反正，被推为江苏都督。7日，镇江林述庆起义成功。在陈其美等的组织下，江浙联军会师，进攻南京，黄兴到沪的次日，捷报传来，联军攻占南京，两江总督张人骏、江宁将军铁良、江防会办张勋先一日逃出南京。上海是当时中国的经济重心，在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条件下，同盟会又争取到江浙立宪派的合作和支持。南京的光复，顿使东南半壁江山代替武昌首义之区而成了革命的重心地区。黄兴到达后，沪上各派参加革命的领袖准备推举黄兴为大元帅，组织临时政府。但一方面，黎元洪享有首义领袖的虚誉，另一方面，孙中山正在归国途中，黄兴因此没有答应就任。而汉阳失守后，在列强驻华使节的参与下，开始了南北停战议和。战争在主要地区停顿下来。

陈铭枢等黄兴卫士到上海后，驻扎在北火车站附近的南海邑馆，黄兴则住在法租界，他们就轮流到黄兴寓所守卫。12月8日，广东北伐军在姚雨平率领下，从广州出发，支援前线，于月中到达上海，旋赴南京驻守，与北军对峙。北伐军中，陈铭枢熟识的人很多，都是广州同盟会的同志，又是客家人。经理部部长邹鲁见到他，就要委他任该部委员，而北伐军的一位营长要他去该营当连长。经过阳夏战争（指汉阳、夏口，即汉口）的考验，陈铭枢愿意带兵作战，为革命立功，在北伐军中担任起连长的职务。而邹鲁对他很优待，仍保留了他的经理部委员的职务。他也从此离开了黄兴的卫队。12月5日，孙中山回国到达上海。1912年1月1日，孙中山从上海前往南京，宣布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就任临时大总统，任命黄兴为陆军部长。当天晚上，姚雨平率领北伐军中同盟会员多人去总统府祝贺，陈铭枢也随同前往。姚雨平和孙中山都是客家人，孙中山就用客家话和他们亲切交谈，表示慰问，仿佛家人闲话一样，使人倍感温暖。

当时，袁世凯正操纵政局，图谋攫取政权。革命党人以推翻清廷，实现共和为基本条件，允诺推袁世凯为民国大总统。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引起袁世凯极大的疑忌。1月初，南北和议濒临破裂，清军在武汉地区施加军事压力，孙中山鉴于袁世凯出尔反尔，不顾信义，决心部署各军北伐。广东北伐军奉命自津浦线向前推进，驱逐盘踞蚌埠一线的张勋等部。陈铭枢率所部过江，进驻安徽凤阳休整。这时发生了一件意外事件，陈铭枢连有一士兵违犯军纪，而团部处置过当，竟将该士兵枪毙，在部队中激起风潮。后经上级调解，以营长作孝子送葬，才算了结。陈铭枢虽未受到牵连，也没有承担任何责任，但事情毕竟发

生在自己负责的连队，处置为难，于是就自动辞职，获准后，回到经理部报到。这是初出茅庐的陈铭枢人生道路上一次小小的挫折，积下了一次宝贵的人生经验。陈铭枢在经理部奉派赴前线兵站随军工作，北伐军在固镇、宿州、徐州三战三捷，大败张勋，进占徐州军事要地。不久，南北和议成立，清帝宣布退位，孙中山也就宣布辞职，推袁世凯继任总统，南京临时政府旋即结束，首都迁往北京。为整理南方各军，黄兴出任临时性的南京留守。

黄兴在南北和议成立后就着手整编南方各军。广东北伐军奉命回师，驻扎南京，改编为第四军，由姚雨平出任军长，张文任参谋长，林震任第二十二师师长，李济深为参谋长。陈铭枢不久就离开了部队。当时，袁世凯安抚革命党人，给予种种待遇。陈铭枢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出洋留学，或往日本，或往法国；一是进入按前清时的军事学校改建的保定军官学校（相当于日本的士官学校，招收陆军中学毕业生）继续深造。陈铭枢选择了进保定军校第一期学习的道路，而把出国进修的资格让给了谢婴白。谢用陈的名字进了日本早稻田大学。陈铭枢留在武昌的好朋友蒋光鼐也同时获得了进保定军校学习的资格，他们两人再次成为军校的同学。

陈铭枢在军校学习期间，中国政局发生了急剧的变化。黄兴在南京留守任上，遭到反对派的攻击，说他有割据东南的野心，同时，他又遇到了严重的财政困难，不得不宣布辞职。第四军为了顾全大局，照顾国家面临的财政困难，也宣布遣散。孙中山热衷于社会事业，希望从事国家建设，避免从事会引起纷争的政治活动。宋教仁等则以为民国已经成立，可以按照西方国家的民主体制，从事合法的议会活动，公开地、和平地竞争政权。为了从事议会竞选，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成为议会的第一大党。但是，袁世凯采取了时紧时松、软硬兼施的办法，不断地削弱革命党人在国家政权中的实际地位，同时，又拉拢分化原先的同盟会员，并和前清立宪派演变而来的进步党结成同盟，共同对付革命派。1913年初，国民党在正式国会选举中获得胜利，宋教仁兴高采烈，准备出任国务总理。可是，袁世凯根本容不得异己派系角逐政权，也不愿意再和国民党人分享政权，一心大权独揽。袁世凯政府把宋教仁看成眼中钉、肉中刺，竟于3月20日在上海收买流氓将宋教仁刺死。黄兴、陈其美搜集到了有关的证据，并协助租界当局逮捕了凶手。孙中山访问日本归来，决心发动二次革命，武装讨袁。

当时，社会上资产阶级和一般人民对政治上的斗争，很不理解，希望国家安定。而革命党人在一年多的和平建设的幻想中，缺乏再次革命的准备，骨干武装多已解散，兵员不足，械弹、经费两缺，战斗意志缺乏，难以很快转入战斗轨道。所以，黄兴一度主张法律解决宋教仁案件。但是，一方面，由于孙中山坚持武装起义的方针，一方面袁世凯对南方革命党人采取了武力压迫的手段，北军在黎元洪的配合下，经湖北进驻反袁最激烈的江西，并把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解职。革命党人终于不得不起兵反抗。7月12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发动起义。黄兴到南京主持江苏独立，安徽、广东、湖南、上海、福建、四川重庆等地先后响应。

保定军校出身的革命党人，一直密切注意着时局的发展。他们对袁世凯独裁的行径和袁对国民党的压迫十分愤怒。江西早已和北洋派处于对抗之中，酝酿起兵。陈铭枢、蒋光鼐、季方等30多人，多次秘密集会，决定到江西去参加起义。正待出发时，回到广东从事反袁的国会议员邹鲁，给陈铭枢去信，要他回来发动关仁甫所部民军起义。关部是广东的会党，绿林武装，曾参加过镇南关起义，钦廉一带也是他们的活动地区。陈铭枢觉得这部分力量也很重要，于是临时改变计划，只身南下，而蒋光鼐等则依然前往江西参加起义。陈铭枢到香港会见邹鲁后，即去广州和朱执信联系，把计划告诉他，朱很着急地说：“广东的民军很难搞，特别是关仁甫最靠不住，你千万不要上当。”朱执信以前就曾策动过民军，深知这些会党武装的领袖作风腐败，孙中山、黄兴在两广发动起义时，就很难指挥他们。因为会党首领难用，革命党人才把活动重心转向新军。陈铭枢听了朱执信的意见，就在广州暂时留了下来。

这时广州的局势很复杂。袁世凯早就派了许多人到广州活动，他利用陈炯明和胡汉民的矛盾，让陈取代坚决反袁的胡汉民出任广东都督。陈炯明虽然也是革命党人，但他的部将们在袁世凯的策反下，纷纷反对宣布广东独立。陈炯明强行宣布后，他们又故意延误出兵援赣。李烈钧在江西苦战，望穿秋水也未见广东援军到来。在江西讨袁军的屡屡催促下，陈炯明再度强行宣布8月1日出师。而这时前清广东的旧军统领龙济光，在袁世凯的策动下，正从梧州率师向广州进逼。广州门户肇庆守军李耀汉投降，陈炯明不得不令心腹将领叶举向三水一线布防，阻击敌军。这下，广州城内外可乱了套，各种反对革命的势力都活动起来。邹鲁和李根源一起去见陈炯明，力主杀一两名图谋叛变的将领，以振军威，但陈不敢下手。8月4日下午，驻燕塘的炮兵团和辎重营叛变，发炮攻击都督府。陈铭枢正好路过都督府，竟被破弹片击伤。陈炯明无力应变，匆匆逃往香港。师长苏慎初、旅长张我权先后自命接任都督，宣布取消广东独立。但袁世凯早已任命龙济光为广东都督，不承认广东将领的自行处置。当时，龙部称济军，乘广州内部混乱之机，于11日进抵广州，逼迫不抵抗的广东陆军让营，激起两军的激烈冲突。但由于广东陆军没有组织，终被济军驱散。

济军占领广州后，邹鲁仍不甘心，企图重新举兵起义。陈铭枢正巧遇见老同盟会员陈雨亭，两人一同密谋制造炸弹，准备等龙济光入城时，实行暗杀。辛亥时期，革命党人受俄国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很大，许多人热衷于实行暗杀。二次革命时，黄兴就曾主张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就是暗杀袁世凯，只是孙中山坚决反对才没有实行。陈铭枢正值青年时代，血气方刚，他从北伐回来时，在上海曾结识了一位福建籍的老同盟会员陈子范，陈在上海海关做事，会制造炸弹，专搞暗杀活动，陈铭枢经常和他在一起，又和自己的几个福建同学结成了一个小团体，很热衷于研究暗杀的方法。这时正好用得上，他还把自己制造的炸弹拿到郊外去作过试验。不料，龙济光部署十分周密，在入城前一天，全市就实行戒严，陈铭枢在自己住的客栈中竟遭怀疑而被捕，带上脚镣，银铛入狱，经受了一次牢

狱之灾。在被敌人搜去的陈铭枢的日记本上，有其他同志开给他的陈炯明的通讯地址，幸好标的是假名“柯先生”，在审讯时，他咬定是自己舅舅的地址，一时得以混了过去。但不久有消息说，和邹鲁一起运动再次举义的广州警察局长陈景华，同陈炯明秘密通讯，被龙济光发觉处死。这使陈铭枢忐忑不安，怕在通讯地址上被敌人对上号而发觉自己的真实身份。还好，那位不认识的军法官，不知道什么缘故，在两次审讯时，好象处处都在为陈铭枢开脱似的，一时也就查不出什么有力的证据。最后，陈铭枢在陆军小学时的同学，他发展的同盟会员李朗如，运用他家是广州有名的“陈李济”药店的地位，把陈铭枢保释了出来。陈出狱后立即乘轮船逃往香港，会见了邹鲁等人。他们都说：“我们已准备好到督署照壁前来收你的尸哩！”其实，他们还曾计划运动陈景华的旧部，实行兵变，攻打监狱，把他救出来。尚未实行，陈铭枢就被保释出来了。

不久，革命形势日趋衰落，袁世凯控制了全国政局。革命党人在国内立足不住，纷纷逃往国外。陈铭枢也从香港转到上海。蒋光鼐等在江西起义失败后历尽艰难，也转辗逃到上海。参加革命的军校同学，重新聚会，大家唏嘘感慨，一时不知如何是好。1913年底，陈铭枢约同学吴吉甫、吴艺五和江西将领方声涛等，一起流亡日本。

二、战乱中的浮沉

陈铭枢一行来到日本时，孙中山、黄兴都已先后到达日本。他们为了二次革命失败的责任问题，争持不下。孙中山对黄兴多所指责，认为黄兴当时没有听从自己的意见，在宋案发生后立即起兵讨袁，而且，黄兴在南京指挥作战，徐州战败后，没有死守南京，竟先行出走，造成全局瓦解。而黄兴认为失败本在意料之中，人民希望和平，不愿死战，使社会遭到破坏。为了贯彻自己的意图，孙中山开始着手组织中华革命党，抛弃国民党的组织形式而另起炉灶。对此，黄兴和一批革命党人也有不同意见。黄兴在同盟会长期从事军事指挥，革命党的军界将校多为黄的部下，对黄也多所亲附。陈铭枢本是黄兴的卫士，他和同志们流亡到了日本，生活无着，只好依靠黄兴接济，按月领取，有时则由李根源分发。当时，流亡日本的革命党人很多，生活十分艰苦，对前途也感到渺茫。黄兴为了把他们集合起来，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在东京郊外的大森这个地方，创办了一所军事学校叫浩然庐，委托老同盟会员殷汝骊主持。陈铭枢也入校学习，共有同学近百人之多。他在校中又结识了一些新朋友，如四川的吕超、陕西的胡景翼，他们虽然都是军人，性格豪爽，但都受过旧式教育，有传统士大夫的修养，爱好书法，后来都成了一代将才。

1914年初，陈其美到达日本后，支持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的主张，并且对黄兴多所攻击，使革命党人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张。孙中山鉴于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期间，党人不能服从他的指挥，他的许多主张不能推行，因此，在组织中华革命党时，要求由党魁全权指挥，如军令一样。在入党仪式中，他要求党员宣誓“附从孙先生”，“服从命令”，打指印，并规定首义党员在革命成功后有参政的优先权，实行一党治国。黄兴反对孙中山这些带有人身依附性的办法，以及特权观念，要求坚持孙中山历来主张的平等自由主义，改善党的

组织。两人各执己见，相持不下。最后，黄兴表示顾全大局，不会另外有所行动，避免妨碍孙中山的计划，并于7月间远走美国。

陈铭枢对黄兴比较同情，同时，他当时的处境也不可能回家乡从事活动，因而既没有参加中华革命党，也没有回国，而在日本继续学习。大森浩然庐结束后，他又在革命党人组织的另一学校——政法学校学习了一段时间。在这里，他学习了一些政治经济学的知识，对他后来的政治思想很有影响。陈铭枢在日本期间，由于黄兴的关系，还接触了一些流亡日本的国会议员等政界人物，如张耀曾、彭允彝、欧阳振声等。这些人是当时反袁派系中的稳健派，一向只主张和平的议会合法活动，并主张和袁世凯有所妥协。二次革命后，袁世凯命令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他们也就被迫流亡日本。陈铭枢和他们的交游，增长了自己的阅历，扩大了社会联系。此外，他在日期间，开始专研佛学，虽和10多位朋友同住一起，他却常常单独去学佛。陈铭枢在日本逗留了一年多，结识了李少川（系与李鸿章同族），成为患难之交。一年后回国到上海，在一家宝记照相馆当小职员。^[2]

不久，袁世凯复辟帝制。进步党的蔡锷、欧事研究会的李烈钧等到云南策动唐继尧起兵讨袁，中华革命党的陈其美在上海也策动肇和兵舰起义。1915年12月25日，云南宣布独立讨袁，护国战争爆发。海外党人也纷纷回国参加起义，陈铭枢的好朋友吕超就在四川组织了一支有力的军队。各地反袁独立运动很快就发展起来，袁世凯的北洋系纷纷离折，各自谋求自己的发展，拆袁世凯的台。袁世凯众叛亲离，再也无法控制时局，不得不宣布取消帝制，至1916年6月6日忧急病逝。黎元洪接任大总统，民国重建，而实权则掌握在国务总理北洋派的段祺瑞手里。

1916年，陈铭枢在护国运动中重回军旅，参加了云南方声涛部护国军，担任连长。他的朋友蒋光鼐、戴戟也在这个部队里。^[3]袁世凯死后，国内局势趋向平静，只是广东的局势还很复杂。龙济光在护国运动中搞了一个假独立，袁世凯死后，段祺瑞仍想支持龙济光任广东督军，但遭到各方面的强烈反对。李烈钧率领的滇军正在粤北，准备进入江西，在韶关遭到龙济光的振武军的阻击，引起战争，振武军战败。陆荣廷的桂军也乘机攻入三水，把龙济光包围在广州。8月间，陆率兵入粤，进驻肇庆，以武力逼迫龙济光下台。龙被迫撤往海南岛，陆荣廷出任广东督军，从此，桂系据有两广。1917年7月1日，张勋演出了一幕复辟丑剧，段祺瑞重新控制北京政局。孙中山看到北洋军阀破坏民国的共和体制，就策动海军追随自己南下广东护法，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然而，两广地区为桂系所把持，孙中山的命令不能出府门，正如孙中山所说，“南与北如一丘之貉”。民国进入了一个军阀混战时期。1918年5月，孙中山在西南军阀压迫下离开广州，前往上海。

在这几年里，陈铭枢没有参加什么重要的活动。孙中山成立护法军政府时，方声涛为元帅府卫戍司令。1918年5月间，方声涛奉孙中山之命，由粤入闽，陈铭枢借故离开部队，到肇军出任游击营长，邓世增为营教官，驻军罗定。^[4]后来的抗日名将蔡廷锴就在这个营里当排长。肇军前统领为李耀汉，前清时系土匪出身，为当局收编。辛亥时反正，出任帮

统，驻军肇庆。二次革命时投降龙济光，护国运动时，又响应护国军，成为驻肇庆的军务院的直属部队，势力迅速扩大，1917年出任广东省长。但李本不属桂系，当省长也只是为人所利用。不久他和桂系的矛盾就尖锐起来，被迫下台，但肇军仍为他所掌握。陈铭枢虽然在一个素质很差的部队，但他打定主意，要以学生为骨干，造就成保卫国家的栋梁之才。因而训练极为严格，连队教练员也极为认真。这支部队本不是肇军的核心部队，上司层层克扣军饷，生活十分艰苦。蔡廷锴回忆说：“那时官兵甚苦，每日只发伙食，官长毛洋四角，班长两毫半，士兵二毫。”尽管如此，陈仍对训练一点也不放松，即使部队执行剿匪任务，也不停止训练。行伍出身的蔡廷锴在军中剿匪时屡立战功，一次，以排长代理连长，率领部队歼灭阳春所属河朗地区土匪100多人，使罗定、阳春地区获得安定。陈铭枢十分嘉许，特赏全连官兵100元，赏蔡30元。继又击溃船步附近的八排山土匪，从此，陈铭枢对蔡另眼相看，时加慰勉。蔡廷锴回忆说：“入肇军一年，当无饷之官长，经济生活虽极困难，而上官之挚爱与学术之增进，精神上却极为愉快。”^[5]在当时条件下，陈铭枢把这样一支部队训练得很有朝气，是非常不容易的。

1919年6月，桂系的广东督军莫荣新下令通缉李耀汉，并派桂系护国军第二军军长林虎率部进驻肇庆，出任肇罗阳镇守使，改编肇军。李的亲信部队则不服改编，重新沦为土匪部队，肇军从此解体。陈铭枢的游击营本非李的亲信，驻扎金鸡一带，奉命调回罗定城听候改编，归林部帮统杨鼎中统率，编为护国第二军陆军游击第四十三营。林虎参加过江西的二次革命，与李烈钧、陈炯明等的联系比较多。陈铭枢在这个部队里的境遇可能好一些。不久，他就选送了5名军官到林虎任堂长的陆军学堂学习。蔡廷锴是行伍出身，没有接受过军官教育，文化水平低，军事指挥和训练能力受局限，所以，陈铭枢在征求他的意见时说：“你办事努力，剿匪有功，送你往陆军学堂读书好不好？”临行前又勉励他说：“你入陆军学堂后，要努力求学问，不要怕辛苦，不可中途灰心。你的排长缺，虽然已另派人，但你毕业之后，不一定在你本连或本营，有了学问，到处都可以做事。”^[6]一片为国家爱才之心，溢于言表。陈铭枢后来回忆当年的指导思想时说：“国家革命的正规军，带兵官只是国家的工具，革命的工具，要求士兵决不要拥护个人，谆谆以此训练士兵，这是针对北洋军阀而言。”^[7]其实，南方军阀也是把军队看成私有财产的。蔡廷锴的回忆，说明陈铭枢当年确实有着宽广的视野。

不久，时局又发生了变化。孙中山离开广州后，让陈炯明带了一支小部队向福建方向发展，并向陈的部队派了许多干部去帮助工作，尽力支持陈部的壮大。孙中山在上海也运用他的影响，争取各方面的联合。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皖系战败，与直系联合的桂系也就嚣张起来。8月间，桂系军队向粤闽边境集中，进攻福建，企图消灭陈炯明部驻闽粤军。在孙中山的支持和鼓励下，陈炯明决心回师驱逐桂系，实现粤军回粤。他分兵三路，向广东挺进。貌似强大的桂系各军，士气瓦解，连连战败。在孙中山的策动下，广东各地方军事力量纷纷起义独立，内外合力，驱逐桂系。10月28日，粤军占领广州。在此

期间，陈铭枢奉命调赴阳江。到阳江后，粤军正攻下淡水、惠州，民军四起，李耀汉也在策动旧部，响应粤人治粤的号召，很得人心，桂系土崩瓦解。帮统杨鼎中，看到大势已去，就把军队四营交给陈铭枢统率。合浦所在的钦廉地区，当时属广东，陈铭枢部也是广东本地的军队，因此，这是一支受桂系制约的粤系军队。当时人的地方观念很强，由粤籍的陈铭枢统带这支军队，可以避免这支军队彻底溃散。于是，陈铭枢就在阳江宣布独立，响应粤军回粤，不久改编为粤军第六军第一纵队，陈任司令，军长即为李耀汉。桂系败退途中，仍扼守肇庆。陈炯明派遣粤军继续追击，陈铭枢部奉命开往西江截击，在四会、连塘一带和敌军作战，等待援军的到来。主力开到后，即协力进攻肇庆，桂系军队全部退入广西境内。陈铭枢部开到连滩整休。这时，李耀汉已没有实力，难以东山再起，不久即去职。陈铭枢和粤军将校的关系甚深，他在粤军中的处境就和以前大不相同了。不久，陈炯明就任命他为粤军第五十四协统领，奉命驻扎两阳地区，即阳江、阳春地区。

陈铭枢驻兵两阳，这里很富裕，向来就是军阀发财的地方。但他认为这样发财很可耻，没有出路，他的目标就是使这支军队成为国家的正规军，成为一支革命的军队。所以，他在罗定时，就用学生做军官。这时，他一方面加紧训练军队，一方面有计划地利用同学关系在广州活动。当时他在广州的朋友，有邓演达、吕超等人，彼此关系很深，可以帮助他。孙中山于1920年11月28日到达广州，重组军政府，粤军也进行整编，陈炯明被任命为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陈炯明部虽是孙中山一手培植、发展、壮大起来的，但是这时，陈炯明的野心开始表露，处处和孙中山的主张抵触。他既不希望孙中山回粤，也不支持孙中山的征兵计划，更不喜欢除了他这个粤军总司令外，还有别的高级军事领导人。孙中山深知陈炯明难以指挥，也深知陈炯明部军队素质甚差。陈部在福建的时候，廖仲恺就曾向孙中山报告粤军“将领浪嫖豪赌”，士兵们甚至认为“与其打广东，不如先打军官”^[8]。因此，孙中山又委派忠于革命的邓铿（仲元）组建粤军第一师，出任师长，嘱咐邓选择素质较优者编建第一师，进行严格训练，作为全军模范。1921年初，邓铿编成第一师，首先编入第一师的3个团，是由巡防营改编而来，素质很差，不符合自己的要求。他又物色力量，编组第四团，拟以军官学生为骨干。这时，陈铭枢的军校同学邓演达正在邓铿手下任参谋，特向邓铿介绍陈铭枢，转达陈愿意放弃两阳地区，接受改编的意图。粤军将领魏邦平又向邓铿介绍了陈铭枢部的军事素养和战绩。予是一邓铿即将陈铭枢部调到广州，改编为第四团。陈的另一军校同学吕超，正任大元帅府参军，又将他引见晋谒孙中山。陈铭枢就此出任粤军第一师第四团团长，少校团副为戴戟，所部由原先的四个营缩编为两个营，营长为陈济棠、李时钦。邓演达为师属独立的工兵营营长，驻扎东堤一带练兵。第一师其他三个团由巡防营改编。第四团在罗定、两阳驻军时，就注意到严格训练，所以有着比较好的素质。第一师在师长邓铿领导下，训练极严。“除日常学术科外，有军官团以研究学术，锻炼身体；有各种禁条，以陶铸德性，即烟酒亦在禁止之列。每星期三六，营内或放电影，或演白话戏，或请名流讲演。凡此种种，皆由于团长陈铭枢专心训练，且由邓师长特别优

待，与以各种便利，故发展长才。因此，全团官兵皆能于无形中养成其高尚人格，爱国精神。”^[9]第四团便成为全军著名的模范，在广东接受孙中山领导的各路将校，如贺耀组（湘军旅长）、林修梅（参军长）都来参观部队的训练情况。这支部队成了黄埔军校成立以前，中国国民党的骨干部队。当时，在陈济棠营任排长的蔡廷锴回忆说：“时师长邓铿，练兵极严，我第四团各官长均属青年，颇具革命思想，对军风纪及操场动作，极为认真，是以当时第四团颇享荣名。那时团长陈铭枢介绍我入中国国民党，我于是遂又成为国民党党员了。”^[10]

孙中山回粤后，一直要求陈炯明举兵讨伐桂系军阀陆荣廷。但陈炯明热衷于作“广东王”，只是用空话对付，不肯出兵。5月5日，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北京政府竟下达讨伐令，命令陆荣廷进攻广东。6月13日，陆荣廷下了总攻击令，分三路出师攻粤。6月20日，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援桂总司令，邓铿为参谋长，第一师为总预备队。但这时，曾受陈炯明策反的桂系沈鸿英部，又受陆荣廷笼络，由怀集、贺县乘虚突袭粤北，攻陷连山、连县、阳山，北江防军李烈钧旧部赣军赖世璜、李明扬诸部向韶关撤退。时陈炯明分三路攻桂，自己驻肇庆指挥，左路攻高州、雷州，中路主力攻梧州，右路由第二军军长许崇智指挥，出四会、广宁攻桂林，迎战沈鸿英。由于沈部进展迅速，威胁广州，特任邓铿为北江总指挥，进行抵抗。陈铭枢部奉命赴阳山阻击，离前线百多里设指挥所，受到赣军赖世璜部败退的影响，也撤了下来。时赖世璜正因兵败垂头丧气，陈铭枢就给了他一个守备铁路的任务，并建议他派别动队到小北江侧击敌人，恢复名誉。赖接受任务后很是高兴。陈铭枢又去会见许崇智部将吴忠信，吴把赖大骂一顿。晚餐时，吴看陈铭枢饭量很大，十分吃惊，原来吴遇战争就吃不得饭。饭后，陈即令准备火把，并很有把握地对吴说：“深夜进军，在敌来攻前占领阳山山地，抗拒敌人。”天未亮前粤军已在阳山山下部署好，占据了有利地形，沈军果然来攻，发现不是赖军，出乎意料，又仰攻不利，士气挫折。不到1小时，陈铭枢指挥所部即将敌军击溃。沈军向江边撤退，正遇赖世璜部，被追击缴械。赖不仅挽回声名，且壮大了势力。当第一师旅长梁鸿楷率大军由韶关进攻，赶到连山时，敌人已被陈铭枢部消灭。这是陈铭枢部改编为第一师后的第一功。第一师本是总预备队，战后即回原防。陈铭枢团得以扩大，成立第三营，由邓演达推荐的缪培南任营长。蔡廷锴也因功调升第三营十一连上尉连长。

这一战役后，第四团训练得差不多了，可以胜任战场勤务，一度还奉派到顺德一带做绥靖工作。陈铭枢本人这时发展也很顺利。由于邓铿在陈炯明面前推荐，陈炯明对陈铭枢也很赏识，很信任。陈铭枢曾回忆了这样一件事：民选县长一事为陈炯明所开创，由地方推出三人，最后由陈本人圈定。他对这件事很重视。他的心腹将领邓本殷推荐自己的秘书长为防城县长，多方活动，陈炯明就是不答应，认为军人哪能干预政事。惠阳县长一职是陈炯明亲自选拔的，他让在漳州和自己共事很久、而且有才干的翁桂清担任，足见陈对县长一职的重视。就在进行民选县长的时候，忽然有一天，邓铿向陈铭枢转达说：“省长传

见你。”陈铭枢很诧异，入见时，陈炯明初次见面，即开门见山地说：“现在全省进行民选县长，你当然知道了。”陈铭枢说：“知道了。”陈炯明说：“你家乡合浦已送来名单，你知道吗？”陈铭枢说：“我离开家乡甚久，毫无所闻。”陈炯明说：“我的部下，不管文的武的，对于合浦情况都无可咨询者，故请问你这三人中，谁可担任县长者，如你不知道，可到下面去了解。”陈铭枢想起来说：“省长提醒了我，我有一个老师，为前清举人，号廖愈簪，为人正派，可以咨询。”陈炯明说：“那好极了，你就下去问问好告诉我，我就照样圈。”陈铭枢很高兴，马上下去找邓世增（陆军速成生，陈的同乡，在阳江有地位），让他找到廖老师。廖说：“这三人都知道，一个是浦北小江豪族，此人决不可用，若一得志，必更增加气焰，欺压平民。一为某地人，没有什么声望。一为城厢里大族王某，为明代以来迁入世族，此人后生，因家中有钱，可以辅之为善，不至为恶。如要推选，此人较可靠，因家中有钱，为人良善，可推荐此人。”陈铭枢听了说：“我全不懂，听你们的话，如果此人不好，怎么办，若不好，怎样对得起省长呢？廖老师你是否可回去当团总呢？因你是老前辈，王某决听你的话，由邓帮助训练团练（合浦匪多），你两人负王某的责，我负你俩的责。”廖邓两人均表示同意。他们又说：“合浦匪多，无枪不行，陈省长对你既有信任，可否请领，但合浦县穷，不能齐价（有许多齐价尚须登记，还领不着）。”陈铭枢当天请见，向陈炯明说明，表示：“我向省长负责，他们向我负责。”陈炯明说很好，问明了入选之后，陈铭枢又说：“现在问题就是要枪支，如没枪，他们不能回去，我也不能向你推选县长。”陈炯明，马上答应，亲书条令：“尽先发枪支 200 支交陈团长领往。”并说王某任合浦县长明天就可发表。陈铭枢退出与廖邓见面时，大家都很高兴，认为陈炯明太痛快了。这件事，使陈铭枢对陈炯明非常感激。^[11]

但这时广东政局又发生了剧烈的变化。1922年3月21日，第一师师长邓铿在广州遇刺身亡，相传系陈炯明部下所为。当时，孙中山主张北伐，而陈炯明主张联省自治，力图自保，阻扰孙中山的北伐计划。邓铿从中调解，十分为难。但邓铿是支持孙中山的北伐主张的。1921年12月10日，孙中山在桂林组织大本营，北伐军的组成，没有陈炯明的部队，而邓铿则由第一师抽调叶挺、薛岳、张发奎3个营组成大本营警卫团，派参谋长陈可钰为团长率领前往，并设法保证北伐军的后勤供应。邓廉正不阿，曾多次截获陈炯明部下贩卖的鸦片，因而遭到忌恨。陈铭枢在南海时突然接得邓铿被刺噩耗，仓皇回到广州，悲恸万状。全团顿失导师，如同孤儿。第四团在绥靖任务完成后，全团仍调回广州原防。但此后情势突变，乌云弥漫天空。孙中山在桂林召开军事会议，商讨对付陈炯明的办法。蒋介石主张回粤讨伐陈炯明，但孙中山仍决定避免内争，因而改道北伐，秘密回师，在韶关设立大本营。但陈炯明仍然不肯服从命令，甚至不和孙中山见面商量北伐事宜，并且以辞职相要挟。4月21日，孙中山下令免去陈炯明的广东省长及总司令职务，仅保留陆军部长一职。陈炯明一时调兵困难，退回惠州，表示要“息影田庐，躬耕养母”^[12]，其嫡系均开回东江。双方的矛盾在北伐问题上迅速激化起来。

邓铿去世后，陈铭枢和邓演达都成了第一师中的核心人物，孙陈交恶，使陈铭枢也为双方所争取。一时人心惶惑。陈铭枢觉得陈炯明对自己有知遇之隆，所以深感难以应付。陈铭枢的朋友如邓演达等人都认为他的处境危险，要陈表明态度，但他始终缄默，大门不出，整天在营房里呆着。经过了两三天，陈炯明的秘书黄居素来找陈铭枢，极力怂恿他把军队开到东江依附陈炯明，陈铭枢仍不表示态度。黄出去到造币厂携来毫洋3000元，给陈铭枢作为开拔费。陈铭枢也不为所动。当时，他认为：陈炯明虽是带兵统帅，但孙为革命领袖，以下犯上，在自己和全团官兵都通不过。自己对孙陈矛盾内幕也弄不清楚，军队是国家的，怎好以个人私恩来行动呢？所以坚决地对黄说：“你的钱我不收，快拿回去吧！等我打好主意再说罢。”陈铭枢作了如此答复后，依然忐忑不安，左右为难，度日如年。正在这时，廖仲恺提出北伐问题。陈铭枢听了喜出望外，以为这是突破难关的好时机，可以摆脱留守广州所处的困境。于是，他马上到师部去见邓演达等人，表示愿意参加北伐。第二天，军队即行出发，向韶关集中。

1922年4月，北方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孙中山正和奉系联合反直，于5月4日以陆海军大元帅名义下令北伐。北伐军由韶关、南雄入江西，粤军第一师由继任师长梁鸿楷率领与第二军等各部一起入赣，进攻信丰，包围赣州。北伐军一路势如破竹，于6月13日占领赣州。这时，孙中山因得密报：陈炯明部图谋叛变，遂回广州坐镇。但孙正倾全力北伐，并未带有重兵。赣州攻克后，截获大量陈炯明和直系联络夹攻孙中山的往来文件。当时，陈炯明系统的叶举所部正控制着广州，于是，迫不及待于6月16日举兵反叛，炮轰总统府。孙中山突出重围，登上永丰舰指挥平叛。北伐军在前线接到叶举造反的消息，乃决定回师，总司令许崇智决定攻占为陈炯明部占有的韶关。在南方政府政局剧变的混乱时刻，第一师全体由梁鸿楷师长、李济深参谋长与各团长共同决定，在赣州成立守中立协会，不参加战争。但第二天抵达信丰后，梁就率3个团连夜向三南方向退入连平，旋归惠州依附陈炯明。陈铭枢团与工兵营和李济深所率师部开赴老隆，决定仍守中立。这时，黄居素又来游说，陈铭枢声明：“有话在先，声明中立，叶举以下犯上，决不能跟着走。现双方也顾不得我，打仗在北江，也犯不了我。”黄又说：“现陈胜了，你难处了。”陈铭枢为了自存，避免引起陈炯明的疑忌，只好敷衍说：“我军可担任游击，侧面策应。”他把军队开出不到几天，北伐军已战败退入福建，战事即告结束。陈铭枢仍把军队开回老隆休整。这样一来，这支军队处境就很困难，孤处异乡，犹如浮萍。陈铭枢进退两难，决心离开军队，准备到南京学佛，观望形势，就以第一营营长陈济棠代理团长。

陈铭枢离团回到广州，仍去叩见陈炯明。陈炯明虽然在开会，还是抽身来会见他说：“你回来很好。”陈铭枢回答说：“军队已安顿好，团长交由营长陈济棠代理。我现在厌倦军事，同时感到没有读着书，想到南京找欧阳大师学佛。”陈炯明开门见山地说：“不必呀！现我计划好了，军队要整顿，要把你的编一独立旅，作为模范旅，马上调回燕塘学习。”陈铭枢对此已毫无兴趣，无动于衷，仍然坚持说：“我少年失学，没有读到书，感到什么

都不行，故要读书。但学佛并非消极的出世思想，而是本佛家大乘无界牺牲的积极思想。”陈炯明劝说：“你正是当事之年，正好作事，何必读书呢？你要学佛，也不妨事，就以佛家精神来练兵也好。北方的冯玉祥不就是以基督精神来练吗？他们军队纪律也很好，你不妨就以佛家精神来练兵。”陈铭枢仍婉辞谢绝。他辞出后，即急忙离开陈的司令部，向同学谢婴白借了路费，当夜离开广州，到了香港。第二天早晨，陈炯明就派了人持枪来找他，陈铭枢幸亏早走一步，免为陈炯明所挟持。^[13]

三、大革命中重回军旅

1922年夏秋之间，陈铭枢由香港到了上海，先住在李少川家里，并安顿了家属，不久即到南京内学院拜欧阳竟无为师，学习佛学。当时为内学院欧阳竟无大师讲学最盛时代，同时，社会上承五四运动之后，各种学术思潮都蓬勃发展起来。陈铭枢也广泛地研习各种思想。例如，张君勱发起了人生观的论战，在哲学社会科学界掀起一个热潮。马克思主义虽然尚隐蔽，但陈独秀的《新青年》已广为人知。徐志摩曾请印度的泰戈尔前来讲学，而张君勱也请来了法国的学者。陈铭枢虽然是一位职业军人，但在这种气氛中他也广泛地和学者们交往。自辛亥以来，改革家和革命者也每以佛学相标榜。如梁启超、章太炎等，他们都以哲学来看佛学，而不是以宗教来看佛学。欧阳大师有《非哲学非宗教》的论文发表，颇引起社会的重视。陈铭枢在内学院时，梁漱溟、汤阳彤、梁启超等著名学者都曾来内学院听讲。也有日本学者来听讲的。陈铭枢还曾一度游历北京，参观故宫、东陵，由京绥路出雁门关，游历云岗等地，开阔眼界。他在北京的时候，认识了梁漱溟和徐名鸿，这两人在后来都和他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陈铭枢在南京学佛期间，国内形势又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陈炯明叛变、北伐军讨陈失败后，孙中山即离开了指挥平叛的永丰舰，前往上海。这时候，中国共产党走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为中国社会注入了一股新朝气。苏俄在十月革命之后，战胜了内外敌人，政权得到巩固，新经济政策取得成功，引起了中国各界的重视。孙中山在上海，开始加强与苏俄和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的联系，以便为显得暮气沉沉的中国国民党输入新的活力。1923年初，孙中山又策动驻闽的许崇智部粤军，和在广西的滇、桂各军一起联合讨伐陈炯明。1月16日，滇、桂军克复广州，陈炯明逃往老家惠州，继续割据一方。同月26日，孙中山在上海与苏俄代表越飞发表《孙文越飞宣言》，奠定了苏俄援助孙中山革命的基础。2月21日，孙中山重回广州，设立大本营，以大元帅名义，节制海陆各军。与此同时，在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孙中山着手准备改组中国国民党。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始了大革命时期。

不过，广东的形势还是很复杂的。陈炯明部依然盘据东江地区，威胁广州。而滇、桂各军，在广州也飞扬跋扈，军纪败坏。汪精卫等一些国民党人一度希望调停孙中山和陈炯明的矛盾，但没有成功。这时，第一师除一团外，都已归附孙中山，梁鸿楷升任大元帅府直辖的第一军军长，李济深任第一师师长。陈铭枢在广州的朋友如第一师的邓演达等人都

常来信，劝他回去。他回信只说：“我只要有决心，我自己就会回来，不必要你们劝驾。”一天，脱离陈炯明、归附孙中山的黄居素（时任孙中山大本营参军）由苏联考察回来，在南京与陈铭枢于内学院见面。黄极力称扬俄国革命的成功，列宁的伟大。经过这一宣传，陈铭枢就决心回粤。不过，他与黄居素商量，单为做官而去，实难为情。他们一度想在促成孙中山和陈炯明的合作上有所贡献，才有光彩，但事实上孙陈合作已不可能，必须作出抉择。陈铭枢与黄居素商量决定策动陈炯明的机关报香港《新闻报》社长兼总编辑陈秋霖脱离陈炯明。陈秋霖与黄居素、陈铭枢都有交情，并不甘心于附和陈炯明。他们俩相信陈秋霖对国民党改组必有同感，又深知其弟兄敢作敢为，天地不怕。于是，就给陈秋霖发去一函，大意说，过去广州方面来邀都未答应，现决定主动回去投效，谅你有此心，同此意，故望你做一件旷古未有的大事。过去只知政变、兵变，从无报变，被人收卖者有之，投降革命者未有，将与国民党不相侔之报纸转而投向革命，知你定能做到。望你准备好，俟我们抵岸相见之日，即能照计划行事。这封信发出去之后，陈铭枢又写信给李章达、邓演达等人，说他们就要南返，并告知行期。10月间，陈铭枢和黄居素从南京经上海到达香港，当即和陈秋霖联系，商定当日换版，陈铭枢挥笔改写了报眉《新闻报》3字，陈秋霖则写了放弃陈炯明、投归国民党的社论，并用红字印刷。香港报纸出得很早，天未亮即发行，12点前广州就看到报纸了。广州革命政府正在开会，大家都很诧异，询问谁与陈秋霖接头，大家都称没有。最后，廖仲恺说，一定是陈真如干的无疑。廖已接到信，说他们即将回粤。当天晚上，广州革命政府就派李章达持汪精卫亲笔信来，迎接陈铭枢和黄居素。汪信中说：“兄等此举，开旷古未有先例，新闻报起义，实贤于十万之师。兹经政府决定，派李南溟同志来迎兄等回粤。”次日中午，陈铭枢与黄居素、陈秋霖、李章达等一起回到广州，立即到革命政府，叩见汪精卫、谭延闿、廖仲恺诸人，受到热烈的欢迎。^[14]

当时广州局面，正是英国香港当局策动广州商团陈廉伯叛变，遭到革命政府的严厉镇压，刚刚成立的黄埔军校学生军成了平叛的生力军。商团肇事期间，廖仲恺、胡汉民等本计划组织全省民团督率处，以与商团对抗，但人选尚未决定。陈铭枢回去后，他们认为陈很恰当，要黄居素协助陈筹备进行。因系创举，无成规可循，黄计划多端，草拟了若干方案，终觉空洞，没有成就。这时，第一师师部在肇庆，师长李济深因兼任西江督办，实际驻梧州。李本是广西梧州人，正运动新兴的广西将校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易帜归附革命政府。陈济棠时已升任第二旅旅长，而第一旅旅长正虚悬着。第一师中粤系军官如团长张发奎，以及几位营长如缪培南、朱晖日、黄琪翔以及薛岳等人，都不赞成李济深专注在广西方面的事。他们倡议欢迎陈铭枢回去，认为陈是粤军中一颗明星，且政府已极重视，应回来参加粤军，不应搞民团。第一师还缺参谋长，他们派人到广州见胡汉民、廖仲恺等人，建议陈铭枢回去任参谋长兼旅长，政府方面当即答应了。不久，陈铭枢就到肇庆接任参谋长兼第一旅旅长职务。第一旅除原来的张发奎的第一团外，陈又推荐蒋光鼐为第二团团团长，枪支由政府拨给，是苏联援助的日俄战争时缴获日本的三八式步枪。当时得到这批

枪械的，除黄埔军官学校外，就是蒋光鼐的这一团。这一团成立时，以原来属第四团的蔡廷锴营作为基础。因李济深长驻梧州，陈铭枢即以参谋长代行师长职务，驻肇庆练兵。

这时，正是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倒曹锟、吴佩孚，电请孙中山北上商讨国事。11月13日，孙中山由广州启程北上，由胡汉民代理大元帅职务，廖仲恺、汪精卫、谭延闿等为党政实际负责人。他们除积极训练黄埔学生军以外，同时整顿各部军队。当时，以黄埔军校为骨干的军队尚未形成，广州革命政府对许崇智部粤军寄予最大希望，而粤军又以邓铿建立之第一师为核心力量。但当时师长李济深兼任广西绥靖督办，长驻梧州。革命政府中人以至第一师若干将领，对李济深专注广西的事，有所怀疑，认为他态度暧昧。所以，革命政府对李信任不够。1925年1月，陈炯明在汕头誓师，反攻广州。广州革命政府决心东征歼灭陈炯明，巩固后方。革命政府计划三路出师，以蒋介石率领黄埔学生军两团（教导第一团团长沙应钦、教导第二团团长沙大钧）和粤军许崇智部为右路主力，滇、桂军分任左、中两路，围攻惠州。出师东征前，廖仲恺找陈铭枢谈话说：“政府即将东征，计划对惠州城采取攻坚战，伤亡必大，要你负责叫李任潮接受政府命令，调你旅为东征后续部队。”同时，廖对陈谈了许多李济深在广西活动的情况。陈铭枢一方面请政府不要对李怀疑，并说：“李之所以常驻梧州，主要由于政府对他疏远，未予重视。”同时，也接受了政府给予的任务，表示要坚决完成。谈话进行了两次，第二次苏联顾问鲍罗廷与蒋介石都参加了。陈铭枢回到肇庆，把东征的事情向部下作了交待，大家都很高兴，磨拳擦掌，准备战斗。第二天，陈铭枢到梧州，先与张发奎团长面商，张完全同意东征，然后就去见李济深。李对第一师分割建制、参加东征表现得非常游移，陈在传达了政府的意见后，立即催李下达陈铭枢旅东征的命令。李迟疑不决，陈即在李的办公桌上，拿起纸写好了命令，请他签署。李仍犹豫，陈竟握着他的手签名。陈作为部下，做法虽然有点过分，但李一签署命令，仍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当晚，李济深在家里设宴，招待住在梧州的第一师高级军官开怀畅饮，陈素不胜酒，竟吃得酩酊大醉。第二天，陈铭枢即率领张发奎全团回到肇庆，并在肇庆集合全旅官兵，亲自拟定了誓师词，印成了单页，每人一张，于广场誓师出发。

陈铭枢旅系东征后续部队。后续部队中尚有魏邦平的何彤旅，吴铁城公安部队的欧阳驹一团，先已出发，到前线听候总司令许崇智调遣。当时，东征军右路各部队于2月间在淡水一战，击溃陈炯明部将洪兆麟、叶举等军，洪、叶部向潮汕一线溃退。右路各军又分三路向潮汕进军，但左、中两路竟期望黄埔学生军失败，因而屯兵不进。陈炯明则调林虎所部由河源出动，袭击东征军右路军后方，同时，令洪、叶等部在黄山阻击东征军。陈铭枢旅于3月1日集中于淡水，即日向海丰前进。陈铭枢率部到达前线后，与总司令许崇智取得联系，11日，奉命于13日进至河婆圩附近。同时，蒋介石指挥黄埔军校学生军于12日向棉湖一带前进，准备与后续部队夹击河婆圩敌军。陈铭枢接命令后当即部署进军。他深感地形不熟，因而认为行动只能快，不能慢，即派便衣侦探范汉杰率领多人侦察敌情，

先行出发。12日下午，范汉杰回来报告：“河田驻有旅长名义率领的部队几百人，当天才开到。”陈铭枢听了十分高兴，决定趁其不备，实施夜袭，于拂晓前消灭敌人，占领河田。果然，天未亮，陈军突击，枪声刚起，敌即逃遁，剩下枪支武器都来不及收拾。陈铭枢来不及扫清战场，即率部急行军进占河婆。黄埔军校教导第一团何应钦部于13日与林虎所部在棉湖西北山地一线遭遇，战斗空前激烈。敌军兵力占有优势，又占领了有利地形，第一团伤亡惨重。同时，黄埔军校教导第二团钱大钧部增援前线，袭击和顺敌军司令部。林虎腹背受敌，河田之敌逃到棉湖，影响了军心，且不知东征军后续部队究竟有多少兵力，林虎被迫率部后撤。^[15]

3月15日，粤军第一旅等后续部队在河婆圩和黄埔学生军会师，陈铭枢也和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以及苏联军事顾问见面。时敌林虎、李一彪部向林虎的大本营兴宁撤退。于是东征军将领当即召开了军事会议，部署向五华、兴宁一线进攻。许崇智总司令从汕头发来命令，命令陈铭枢率后续部队由五华向兴宁进攻，而给蒋介石的命令，目标相同，攻击任务相同，但两军竟无统率关系，好象都是隶属总司令部。陈铭枢一见命令就领会到许对蒋有意见，即向蒋说：“今无统率关系，我当然受你指挥。我准备好，等候你的命令好了。”蒋听了也面带笑容，表示满意。陈铭枢指挥的后续部队有4个团，即魏邦平的何奎团，吴铁城的欧阳驹团，张发奎团，蒋光鼐团。但魏、吴两部都已赶不上。第一旅只有5个营参战（张3个营、蒋2个营），经五华进入兴宁附近山地过夜。当时，军事由苏联顾问指挥，他不了解中国情形，尤其不懂山地战术，硬性命令：钱大钧指挥第二团向兴宁大道进攻，张发奎的黄琪翔营拨归钱指挥，陈铭枢带张蒋两团各2营围攻西北门，何团作校部总预备队。林虎从棉湖撤退，并非溃退，有充足的时间部署，兴宁又是林虎的根据地，攻击不易。大家见到这命令，都摇头说：“俄顾问怎懂中国战术呢？不懂山地战，怎知敌会在城里抵抗？脑子里未考虑山地，北方军队也不考虑山岳地带，而南方军队才知山地之重要。”大家认为放弃兴宁城外神龙山有危险，不能不顾。陈铭枢即找蒋介石一同去向苏联顾问力争，但苏联顾问不听，说命令下了，你去执行吧！蒋也不能作主，因顾问有最高的指挥权。陈铭枢无结果回来，张发奎发了牛脾气，回去睡觉了。陈只好亲自用口头命令部署张团向神龙山上下要地扼守，自己即率蒋光鼐一营在后，也在山下宿营。陈判断敌从水口方向来的增援部队，一定从神龙山下来，钱团和调归钱指挥的黄琪翔营一定胶着于东南门，置于无用武之地，敌来攻我，怎样抵抗呢？陈考虑再三，即连夜匆匆去见蒋介石。蒋也正忧心忡忡而未能入睡，陈即建议说：“钱团已胶着于无用之地，何必再增加黄营呢？我意现在时间不够了，重新部署已来不及，何不将黄营归还建制？”蒋同意了，说：“命令已来不及，你且接命令调回吧！”陈连夜亲自寻找部队，传达命令。3月20日晨，他回到旅部不久，战斗就开始了。所有部队都加入战斗，陈直接控制的仅特务队一排人。这时，正好轻雾中阳光散出，敌潮水般涌来。正巧黄营出发稍迟，刚赶到前线，敌在山上不知我有多少部队，为此形势所吓倒，攻势顿挫。陈也知黄部赶到，即指挥全旅猛攻，占领神龙山。敌除少数

人逃走外，全部被俘虏。是夜，教导第二团在陈铭枢旅的协同下，攻占兴宁，林虎孤身逃走。23日，陈铭枢又奉蒋介石之命，率本旅并指挥钱大钧团向梅县进发。翌日占领梅县，追击逃敌获胜。敌向赣边撤退，东江从此肃清。革命军集中潮汕，陈旅驻扎梅县，蔡廷锴营也从梧州赶来归还建制。许崇智以陈铭枢作战有功，单独召见，加委为记名师长。通过东征战役，陈铭枢和蒋介石建立起了密切的关系。

这时，孙中山在北京于3月12日逝世的消息传到军中，这是革命的重大损失。参加东征，坐观龙虎斗的刘震寰、杨希闵两部竟趁机叛乱，据有广州到惠州间地区，而以石滩为军事要冲。5月13日廖仲恺到达汕头，与许崇智、蒋介石及苏俄军事顾问加伦商讨平叛计划，推蒋介石为总指挥。忠于革命的东征军右路各部，决定回师广州，讨伐刘杨。同时，北江、西江和广州大本营各部也配合战斗，一路进展顺利。陈铭枢率本旅沿东江进广州大道宣薄燕塘，6月12日，向瘦狗岭进攻，以张发奎团作前锋，蒋光鼐团作预备队。张团在攻击时，遭到敌军强力抵抗，十分危险，陈当机立断，面命蒋团绕向敌军左侧进攻。结果，敌人纷纷溃败，蒋团即乘隙长驱直入，占领了市区。

8月20日，国民党左派廖仲恺被刺身亡。胡汉民、许崇智都有刺廖嫌疑，蒋介石乘机排挤胡、许的势力，对陈铭枢等粤军将领多有笼络。9月19日晚，蒋介石作了军事部署，翌日晨将亲许崇智的许济、莫雄两部缴械。当天，许崇智被迫卸职。陈铭枢奉蒋介石之命，拿了赴上海的船票和2万元钱，强行护送许崇智上船出境。^[16]

平定刘杨后，广州革命政府于7月1日改组大元帅府为国民政府，广东革命军扩大编制，采用苏联的一师三团制，编组国民革命军序列。这时，陈铭枢因军功而洋洋得意，自以为是，未能处理好与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第一师师部仍驻肇庆，却未加联络。他后来回忆说：“同时因功高震主，使李任潮不安，加以第一师中一些小人，随而媒孽其短，第一师除邓演达外，都群起而攻，并向政府首脑胡汪廖等人处控诉。”但革命政府对陈铭枢信任有加。当政府计划扩军时，陈正卧病在颐养园休养，李章达奉廖仲恺之命来看他说：“第一师对你不好，知道否？政府拟把你的部队拉出第一师，另编为一独立师，这对你有好处。”陈答：“我不考虑这一问题。我因尊重邓仲元师长，不愿离开第一师范围，至于别人对我如何如何，那是他们的事，况在革命队伍中，那怕个人攻击。”于是，原粤军第一师扩充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时，陈铭枢仍出任该军第十师师长，下辖原蒋光鼐一团，另编组一团。张发奎一团扩编为独立旅。这时东江方面陈炯明残部又在蠢蠢欲动，9月间，国民政府决定出师第二次东征，任蒋介石为东征军总指挥。时李济深为第四军军长，国民政府召开军事会议，陈与李均参加。会议决定由李本人率部参加东征，另以平定南路的任务交给陈，于10月5日任命陈为南路总指挥。当时，南路由陈炯明部将邓本殷、申葆藩占据高州、雷州、钦州、廉州、琼州、崖州、罗定、阳江等地，因陈是南路的廉州人，部队又是从南路这一带发展起来的，可以兼顾。陈铭枢即在江门设立指挥所。当时，政府财政十分困难，军需全力供给东征军各部，陈铭枢的南路部队，必须自己筹款。他一面筹款，

一面与广西方面联系借兵，并请第三军军长朱培德支援。陈炯明为牵制东征军，命南路的邓本殷进攻江门。因敌众我寡，陈铭枢于18日向蒋介石告急，但奉命固守待援。陈铭枢待敌深入至鹤山单水口与敌激战，以少击众，于29日击溃敌军。陈指挥所部乘胜追击。不久，朱培德率部到达前线，并受命任南路总指挥。陈铭枢奉命接受朱的指挥，以所部为第一路，与友军会攻南路。同时，广州国民政府多次电令严禁收编溃兵，陈一面表示接受朱的指挥，一面认为，敌军本系收编的土匪，能胜不能败，若不收编，必至成为流匪，小则糜烂桑梓，大则会给北伐以后顾之忧，敌仍率部进击，并给予敌军各种名义，大事收编。陈铭枢部就这样一直到了钦廉。11月30日第十师进驻合浦，翌日，陈铭枢到县，安定社会秩序，旋将指挥部移驻北海。

廉州为陈铭枢的故乡，他一面致力于安定社会，将收编的部队设计缴械遣散，调停合浦陈姓和叶姓两大宗族，一面维护国家的独立主权。这里也是通商口岸，当地有一盐务稽核所，直接由总税务司管辖，地方政府向来不敢干预。陈铭枢即命令法国领事及稽核所的洋人，将税款交与革命政府，将主权收回。^[17]

四、北伐名将

1926年间，国民革命进入高潮。当时，两广已统一在国民政府的领导之下，而北方各军阀集团恐惧革命运动的发展，正准备联合进攻两广。这时，在国民革命运动高涨的形势下湖南人民掀起了讨吴驱赵运动，将主张所谓联省自治的湖南土皇帝赵恒惕，于3月12日逐出长沙，由湖南省防军第四师师长兼湘南善后督办唐生智代理省长。赵本和直系军阀吴佩孚有联络，受吴的支持。唐一面仍和吴进行联系，缓和压力，一面同广州国民政府和广西当局建立联系，希望取得军事支援。唐系保定军校时陈铭枢的同期同学，早就派保定军校同学刘文岛（也是陈铭枢的同学）作自己的代表，到北海和陈铭枢取得联系。陈铭枢在进军廉州时，刘文岛夫妇就抵达军中，和陈铭枢一起进入北海，要陈向国民政府转述其输诚革命之意。一时间陈唐函电往返十分密切。当湖南时局突变之际，陈铭枢即离开北海前往广州，于3月9日到达，和广州国民政府方面接洽。^[18]3月14日，陈铭枢和白崇禧受国民政府委派，与唐生智的驻粤代表刘文岛一起，秘密由广州出发，经韶关于25日上午凌晨3时到达长沙，考察湖南情况，并和唐生智进行谈判。白崇禧系驻广西的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参谋长，唐也正和广西方面联系，以求得支援。同日，有了国民政府的支持，唐生智当即解除了赵的亲信将领的职务，接任代理省长，其军队前锋已占领岳州。这就构成了对据有湖北的直系吴佩孚的威胁。吴也就支持叶开鑫等湘军将领反对唐。

陈铭枢、白崇禧在长沙和唐生智谈判时，向唐保证，叶等一有行动，就出兵帮助唐生智。同时，唐担心参加国民政府的谭延闿、程潜的第二、六两军如回湖南将对他不力，因为，这两部湘军是被唐驱逐出去的，对唐恨之入骨。陈铭枢、白崇禧向唐担保二、六两军将进军江西，不会经过长沙，终于说服唐参加国民革命。^[19]同时，陈铭枢和唐生智就战略问题也作了深入的讨论，认为在反唐军队南下时，“长沙无险可守，无论胜负，均应退出

长沙，集中衡州，以逸待劳”。^[20]这时，国民党和共产党在长沙均已公开活动，陈铭枢、白崇禧在长沙连日出席群众集会，鼓动革命情绪。在28日各公团欢迎会上，陈铭枢表示：“湖南现时成此局面，实由于湘省民众之努力。我等到了长沙，即如国民政府实力到了长沙，就是湖南民众之革命运动成熟的时机。但现在帝国主义与反动军阀，互相勾结，宰杀民众，我等主义是求革命。革命工作以民众为基础。希望本日到会诸先生、各组织、各团体，齐集于国民党旗帜之下，一致努力革命工作，而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他又特意指出：“唐省长对于国民政府所提条件，完全接受，其事实各位可以看见。”^[21]在30日长沙市国民党员的欢迎会上，陈铭枢还阐述了国共关系，他指出：“国际共产党之与本党合作，其目的与本党相同，同为世界被压迫民族而奋斗。如帝国主义者及军阀加以攻击，吾人当知有联合战线之必要。盖共产党是国际的，国民党是中国的，国民党之革命，不过世界革命之部分。”^[22]在31日的市民欢迎会上，陈铭枢向民众表达了来湖南的自的和决心：“兄弟此次来湘，系负有革命的使命，并借此观看湖南民众对于主义之信仰及与国民政府之合作，同时，要湖南政府跟随我们革命。如果湘政府与吴佩孚联合来打我们，我们是欢迎的。因我们之来，绝不是一种妥协的，是为革命的。”^[23]4月2日，湖南工农举行欢送国民政府代表大会，陈铭枢在会上阐明了他对群众运动的观点：“年来粤省肃清反革命派，如二次东征，及讨杨刘、平南路，工农力量实居大半，故工农实革命军之大本营……但工农亦当有组织，听指挥，而为有规律的运动。”^[24]这个观点，将影响他今后的道路。4月3日上午，陈铭枢和白崇禧离湘返粤，唐生智及湖南各界四五千人到车站欢送。欢送会主席夏曦在致词时吁请国民政府“速即出兵到湘北伐”。^[25]在此期间，陈铭枢曾屡次致电国民政府，大意说：唐生智对国民政府意思完全采纳，长沙民众连日开会欢迎，革命空气布满全湘。^[26]4月15日，陈铭枢和白崇禧到达韶关，因土匪破坏铁路，行程受阻。他们急于向国民政府汇报：不得已，请第二军派兵护卫，绕道南下，于19日晚到达广州，第二天就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报告赴湘接洽情况。那天，军事委员会主席蒋介石没有出席会议，陈铭枢和白崇禧于22日又赶到黄埔军校向他报告。

由于唐生智向国民政府靠拢，吴佩孚以援助赵恒惕为名，任命叶开鑫为讨贼联军湘军总司令，驱师南下，压迫唐生智。唐被迫于5月1日放弃长沙，退守衡阳。5月10日，唐生智的代表刘文岛到达广州，向国民政府求援，住在第四军军部，和国民政府联络。第七军军长李宗仁同日也到达广州，向国民政府请求北伐。第七军前锋且率先进兵，帮助唐稳住战线。当时，在北伐的问题上，国民政府内部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主张乘北方军阀自相混战之机，迅速出兵；一种意见主张先巩固广东内部，随后相机北伐。但事实上湖南的局势，如箭在弦上，不能不发。第四军军长李济深及所部将领都热烈赞成北伐，在李支持下发展起来的广西的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李宗仁、白崇禧等将领，也热烈赞成北伐。在这种形势下，11日晚，国民革命军各军长在国民政府内召开军事委员会重要会议，蒋介石也赶来出席。决定先行出师入湘，援助唐生智，并任命唐为北伐前敌总指挥。但第四军正散处

广东各地，遂决定两师留守广东，集中两师北伐。由于湖南形势紧急，驻广州第四军独立团（团长叶挺）奉命于5月20日先期出发，6月3日，在安仁淩田之役击退敌人。第十师、第十二师（师长张发奎）作为北伐先遣部队，也奉命迅速向韶关集中。陈铭枢赶回北海集中部队，向全师官兵讲述到湖南接洽的经过，进行北伐的战斗动员。他先调整了指挥系统，由蒋光鼐专任副师长职务，而由蔡廷锴接任二十八团团长，由范汉杰任二十九团团长，由戴戟任三十团团长。陈铭枢率领二十九、三十两团先行出发，远在钦州的二十八团集中跟进。这时，国民党中央于6月4日正式通过了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案，翌日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唐生智也先于6月2日在衡阳正式接受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职务。6月21日，陈铭枢率卫队从广州乘车出发，李济深等送行到达黄沙车站，而第十师主力已到达前线。^[27]第四军由副军长陈可钰率领第十师、第十二师，由韶关经郴县、永兴入湘增援。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战争正式开始。

这时，唐生智鉴于第四军已于21日前后进抵郴县、安仁地区，湘江东岸已能保证安全，主张全线出击反攻长沙。陈铭枢也致电国民政府，认为：“唐总指挥决心提早反攻，必可操胜利，以我军准备完好，叶开鑫、贺耀组诸逆，尚相恐惧，不能统一指挥，趁其团结未固之机，攻之易于瓦解。且我军若进占长沙后，敌非多日整顿，不敢来犯，我仍可待后续部队齐集，于全局大计，丝毫无妨。此乃劳少效多，计之所得。”^[28]唐遂于7月5日，分兵三路进攻长沙，唐自任中路，佯攻涟水，以左路第八、第七军各部为主攻部队，进取长沙，以第四军为右路军，进取醴陵、株洲，以牵制敌人。各军进展顺利。7月10日，第四军向醴陵进攻，强渡淩水，敌赣军第一师唐福山部向浏阳溃退。右路军攻占醴陵，并监视赣西之敌。不久，蔡廷锴到达醴陵，晋谒师长，陈对他说：“醴陵之役，若果你团同来，敌军唐师必被我消灭。将来立功机会甚多，现在尚有时间在此逗留，快把部队整理好。”时主力集中醴陵休整，掩护北伐后续部队集中。

总司令蒋介石于8月4日在郴州召开作战会议，决定先攻取武汉，相机克复江西。对湘北鄂南作战，以第二、第四、第六、第七及第八等5个军，分三路进攻，由第七军任左翼，在岳州通城间前进，由第八军即唐生智部任中路，沿铁路线前进，由第四军任右翼，经平江向通城进击。当时，右翼敌军兵力最强，而第四军兵员最少，各方面担心第四军难以胜任任务，但蒋介石和俄国顾问加伦深信第四军能够完成任务。第四军即奉命向汨水一线推进。当时吴佩孚正在南口指挥与冯玉祥的国民军作战，无法抽身南下，仅令湘鄂军坚守汨罗江一线，并调豫军入鄂增援。第四军与友军各部于8月15日开始行动，18日进入攻击位置，于19拂晓开始攻击。第四军第十二师，以一部攻击汨水南岸天岳山敌阵地，主力由白雨湖渡河，向平江以东以北包围攻击。第十师由托田附近渡河，经三眼桥向大山、淡江攻击。至12时，第十二师攻占平江城，歼灭敌陈嘉谟一个旅。陈可钰代军长进驻平江，命令第十师20日向梅仙市、21日向马鞍山追击，而第十二师20日向八里岭、21日向南江桥追击。22日，陈铭枢率第十师于九岭附近击退吴军王献臣（浚滑游击司令）两个

团，进克通城。

8月22日，南口战斗结束后，吴佩孚自保定率两个师南下。8月25日夜，陈可钰于军司令部获悉，岳阳、通城被击溃之敌宋大霈（湖北暂一师）、董振国（援湘军第四路，兵力相当于一个师）、孙建业（旅）、王梦弼（旅）、李乐滨（旅）等残部，刻已退守汀泗桥附近，由汉口增援的第二十五师之第一百团及其军官团第十大队，与王献臣部（兵力约一团），占领汀泗桥西侧高地，在赤岗亭一线固守，其阵地沿河展开，构筑极为坚固。陈代军长决心于26日攻击该敌，于25日22时下达攻击命令，要旨如次：一、第十师明26日晨4时，由七星冲附近经饶家、骆家湾、赤岗亭，向古塘角至汀泗桥（不含）之敌攻击。二、第十二师（欠三十六团），明26日晨6时由中和铺沿铁路前进，攻击汀泗桥及其西北之敌，并与第十师协同将敌包围而歼灭之。三、第三十六团明26日晨，由石坑渡前进，向汀泗桥东南，协同第十师对敌包围攻击。26日拂晓，第四军各部队依令开始行动。10时30分，第十二师之先头部队第三十五团，进至汀泗桥西侧之铁路桥头，遭敌炽盛之机关枪火力射击，无法前进。河水深阔，不能徒涉，遂与敌隔河对峙。12时许，第三十六团（军直辖）亦到达汀泗桥东南阙家湾附近，遭敌据守该处高地之火力阻止，前进困难，停止于现地待机。是时，陈铭枢率第十师已至骆家湾附近，获悉第十二师已与敌人发生战斗，即展开于三十六团两侧，与第三十六团协力，对赤岗亭一带之敌攻击，以第二十八团为预备队，位置于骆家湾附近。14时许，吴佩孚军向第十师右翼迂回，该师以预备队第二十八团，推进至张兴国，攻击稍有进展。夕刻，第二十八团向尖山寺附近推进，对咸宁方面警戒。入夜后，第十二师主力逐次迫近敌阵地，是时军司令部已推进至黄土岭附近。是夜，因长江决堤，河水暴涨，进攻益形困难。第十二师师长张发奎亲率独立团及炮兵营，沿右翼第一线后向古塘角迂回，准备自第十师之右侧包围敌人。但因河水高涨，接近前线中部时，两部不能会合。战况空前激烈。傍晚后，第三十六团团团长黄琪翔找到陈铭枢和苏联顾问，认为如今夜不能解决战斗，明天敌军增援到达，我军将十分危险，建议依靠我军士气高涨，不顾任何牺牲，当夜实行全线夜袭，突破前面高山阵地，以挽救危局。陈铭枢接受了黄团长建议，以为这次战斗关系全局，不容轻忽。于是，下令第二十九团及三十六团与第十二师联合，于夜12时实施突袭，以打破敌人的中线，第二十八团绕过朱家铺、山窝窠、万安村到铁路一带，以截断敌人退路。独立团的一营转变为后备队留在张兴国。敌人从汀泗桥北岸斜面夺取左边高山，严密防守，系敌重要阵地。陈铭枢督率各团长冲入敌阵，彻夜格斗，双方伤亡均重，戴戟团长也受伤。但敌众我寡，数次冲锋，未能得手。陈铭枢面临困难，气不稍馁，以为我不杀敌，敌即杀我，复严督各部强行冲锋。27日凌晨3时，第十师突破敌人阵地，攻占汀泗桥东侧高地玛瑙岭，4时许，第十师各团、第三十六团、独立团协同包围敌之左翼。吴军亦发起逆袭，双方反复冲杀，激战两小时，终将吴军逐次击破。第二十九团及第三十六团，猛攻数次，至6时30分克复石鼓岭。汀泗桥东南一带高地，悉为第十师及第三十六团攻占。吴军大部沿铁路线向咸宁方向溃退，一部仓皇乘船

向赤城湖逃逸，落水者甚众。7时30分，第十二师从正面强袭通过铁桥，进占汀泗桥市街，并尾追沿铁路败退之敌。9时顷，由汀泗桥败退之吴军被第十师之第二十八团及第三十团截击，全部俘虏。独立团及炮兵营迂回至古塘角，吴军已全线败退，第四军即跟踪向咸宁方向追击。^[29]

北伐军攻克汀泗桥以后，吴佩孚于27日亲至贺胜桥督战，统率刘玉春师等部增援。第四军司令部决定在敌援兵未到之前，与第七军协同攻占贺胜桥。命令29日夜，第十二师进抵黄沟岭，第十师进抵官埠桥，以第十师任预备队。30日晨5时，进攻开始。第十二师发动猛攻，突破杨林当敌军阵地，即进行追击。战斗激烈时，敌企图向十二师右翼包围，陈铭枢当即派一团强行军增援。第二十八团一度向敌猛攻，但仍采取守势。敌军全线溃退后，二十九、三十两团即跟踪追击，超过火线，俘虏大批敌军，第十二师则得以集合休整。12时，贺胜桥完全克复。

贺胜桥战后，蒋介石即命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传令速攻武汉，并预委陈铭枢为武汉卫戍司令。^[30]北伐各军进入追击作战，陈铭枢率第十师作为追击的先头部队，日行在百里以上，所有战利品均交友军收管。31日夜，第十师先头团（一说为黄团，一说为范汉杰团，该两团建制记载时有混乱）尖兵抵达武昌时，城门尚开。据说军中的苏联顾问命令陈铭枢率第十师紧迫惊慌失措的敌人，突入武昌，陈铭枢不顾苏联顾问铁罗尼的抗议，拒绝冒险深入敌阵，而转入防御。敌第八师、第二十五师、湖北督军陈嘉谟等部约15000人退入武昌，负隅顽抗。9月1日，各军先后到达武昌城下，予以包围，部署攻城。第十师位置从会意门到宾阳门，于3日凌晨2点，陈铭枢在洪山附近召集各营长以上军官训话，进行战斗动员。3点，第十师自宾阳门外向城内猛烈射击，但攻城部队受到敌人火力的压制，各团停留在城边，攻击受阻。第二天，北伐军调整部署，第十师由宾阳门到忠孝门一线进攻。陈铭枢接到攻城命令后，即传达到各团，训令各团组织敢死队，分成两队，一队与第二十八团联合，向忠孝门进攻，一队与第三十团联合，向宾阳门进攻。5日凌晨3时，敢死队向城根突进，但距城根15米处即遭敌军从城上丢下的炸药和火力封锁，伤亡过半，几次突击，均未成功，只好转入防御。北伐军司令部鉴于攻击受阻，命令部队转入封锁武昌，采取长围久困的办法，迫敌投降。敌军由于缺粮，一度组织突围，但遭到北伐军的严密监视，未能得手。城内的河南第三师则秘密和唐生智、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接洽投降。经一个多月的围困，攻城条件成熟了。10月2日，为了防止敌人突围，第十师等部奉命把原阵地交与友军，向江岸开进。但不久发现敌人战力薄弱，第四军司令部决定第十师等部停止转移阵地，部署攻城。第十师作为攻城主力，陈铭枢奉命率部由中和门进城向蛇山前进。陈即命二十九团保卫由报国塔到紫金山的阵线，自己于9日晚12时亲率第二十八团、第三十团由洪山出发，进抵长虹桥。10日凌晨2时，敌第三师打开了保安门，不久，楚望台的新边门也打开了，接应北伐军入城。第十师各都攻入城内，前卫第三十团经过中和门夺取蛇山，第二十八团向东侧扫荡敌军，至7时，肃清了中和门到蛇山的全都敌军。北伐军终于

占领了武昌。

注释

[1] 陈铭枢：《我在辛亥前后所接触的人和事》，《文史资料选辑》第75辑。

[2][3] 陈铭枢：《我的禅观》，《现代佛学》第1卷第8期。

[4] 《蔡廷锴自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5页，1919年部分，“不久，本连奉命移驻连滩，上峰委陈铭枢任营长”。按肇军1919年解体，蔡列入1920年部分，据此，当是1918年间事。

[5][6][10] 《蔡廷锴自传》第118页；121页；135页。

[7][11][13][14][17] 陈铭枢未刊回忆录稿。

[8] 《双清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71-372页。

[9] 华振中、朱伯康合编：《十九路军抗日血战史》，神州国光社1947年版，第2-3页。

[12] 广州《民国日报》1922年5月1日。

[15] 据陈铭枢未刊回忆录稿，又参见《国民革命战史第二部·北伐统一》第2卷，台北1980年版；《陈炯明的一生》，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6] 严如平、郑则民著：《蒋介石传稿》，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88页。

[18] 陈铭枢未刊回忆录稿，又据陈铭枢：《北伐之经过及其成功之原因》，《广东省政府主席陈铭枢之言论》第175页。日期据长沙《大公报》1926年3月24日。

[19]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台北1985年版，上册第39-40页；下册第796-797页。

[20][26][27] 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5月7日；4月10日；6月22日。

[21][22][23][24][25][26] 长沙《大公报》1926年3月29日；31日；4月1日；3日；4日。

[28] 台湾国防部史政局编：《北伐战史·二》，台北1967年版，第339页。

[29] 黄琪翔：《大革命洪流中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文史资料选辑》第94辑；《第十师交战的一般情形》（根据师长陈铭枢报告），《北伐战争·汀泗桥之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95-96页。

[30] 见陈铭枢：《北伐之经过及其胜利之原因》。